

# 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包容性：以厦门市的中 产阶层为例<sup>①</sup>

王嘉顺\*

(华侨大学社会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态度是社会包容性的内在体现。本文主要探讨城市中产阶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态度, 进而分析该群体的社会包容性。基于2013年的调查数据, 作者通过构建社会包容指数来观察和分析中产阶层社会包容的社会态度特征。研究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态度整体较为包容, 但是不同类型的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态度差异, 边缘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呈现出不包容的特征, 而新中产阶层、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态度相对较为包容。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与不同类别的中产阶层的产生背景及嵌入的政治经济结构有关。

[关键词] 中产阶层; 社会包容; 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5) 02-0023-08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 (一) 从政治到非政治：中产阶层产生及研究的两条路径

中产阶层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不断壮大的新社会群体之一, 它的存在及其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关注有两个较为明显的方面, 一个是对该阶层的识别和界定(李春玲, 2003, 2011; 李路路、李升, 2007; 李培林、张翼, 2008), 另外一个则是讨论该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和影响(李路路, 2008; 李路路、王宇, 2008; 李春玲, 2008)。其中对社会政治功能和影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也有从一般角度探讨其社会态度的, 但是主要内容仍是针对社会政治态度进行分析, 使得中产阶层态度研究的内容集中于此。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渊源, 自托克维尔将政治文化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之后(托克维尔, 1988), 这股研究热潮从未间断过。研究政治文化的人相信“一个社会中公民个体层次上所持有的一系列民主价值观念是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的”(卢春龙, 2011)。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文化, 阶层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斯梅尔, 2006), 所谓阶层形成的文化理论认为, 当个人和集团先是通过经历, 最终通过意识来使自己处于社会等级结构的某一位置时, 阶层认同便产生了(斯梅尔, 2006), 阶层也得以形成。阶层意识成为人们格外关注的

<sup>①</sup>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1BSH0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2YJC840038)、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编号:JA13032S)资助。

\* [收稿日期] 2014-12-23

[作者简介]王嘉顺(1981-), 男, 山东青岛人, 华侨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焦点，而阶层意识又从何而来？政治行为，甚至政治斗争是阶层认同或阶层意识产生的唯一途径吗？事实并非如此，在从政治到非政治的坐标系中，共享特殊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也是阶层认同形成的一条途径（斯梅尔，2006）。事实上，在一个政治较为稳定的社会里，观察非政治性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可能会为中产阶级研究带来新的发现。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研究中产阶级的非政治性社会态度是可行的。

要得到对中产阶级更全面和客观的认识，研究其社会态度是不可或缺的（严翊君、李小红，2011），而对社会态度的考察应是多面向的。从学术渊源来看，关于社会态度的研究可以划分到社会心态这一更高层次的研究领域，从社会心态的结构来看，社会态度属于变化较快且明显的部分，体现为一种“情境性、评价性内容”（王俊秀，2014）。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社会心态属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马广海，2008）。自学者们关注中产阶级伊始，群体心理即是了解和研究该阶层的重要渠道。在众多的研究中，米尔斯充分关注到了中产阶级的心理，他明确地提出当今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把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个人在其内部的生活和在其外部的职业经历所包含的意义描述出来”（米尔斯，1987）。

## （二）问题提出

对今天的中产阶级来说，职业的影响要比财产的更大，至少对新中产阶级而言是如此（米尔斯，1987：91），而职业的获得，即使面临职业结构的不断扩大，也依然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竞争。并且职业也不再仅仅是一项生计，它还是名望与权力的体现。名望如同职位，它们都是稀缺的，它们都需要被争得。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竞争是常态，竞争的对手来自各方，通过竞争，社会流动才能维持一定的活力。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奋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除了“向上爬”之外，还有一条途径可以方便且结构性地提高自己的地位，那就是大量社会地位更低的外部社会成员进入该社会结构，比如，大量流动人口代替了原先的社会底层，所以原先结构中的成员都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也能发现（李若建，2003）。另一方面，虽然地理上的流动并不一定导致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其中蕴含着地位上升的机会，流动人口有更多的机会同城市中产阶级展开地位竞争。对于这种竞争，中产阶级群体会如何看待？会像米尔斯所说的，他们看不起后来的人，并将其视为威胁自己的竞争力量吗（米尔斯，1987）？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它还有着独特的意义。在市场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职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背景下，大量中间的社会结构位置被创造出来，需要有人去占据。这些结构体现在职业和产业等维度上，但是对于转型中国而言，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困扰国家长期发展的障碍，人口在城乡间有流动无迁移，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性成为一个悬疑。这种状况对中产阶级可能部分有利，因为当大量流动人口经历城市化之后，中产阶级保留原有社会结构位置的难度加大，即失去原先结构位置的风险在加大，中产阶级对此的态度值得深思。他们对流动人口是接纳、包容还是拒斥？他们如何看待新来者，是新的邻居，还是社会地位的挑战者？虽然已经有研究讨论过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态度等类似的问题（王嘉顺，2010），但是中产阶级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态度可能有自身的特点。对国家发展目标来说，实现新型城镇化是完成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必由之路，而且在多群体利益关系格局下，中产阶级应抱持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这应是一个成熟的且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心态和责任感。但是他们是否具有开放包容的

心态？本文以城市中产阶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态度为例，试图考察该群体的社会包容性。

## 二、数据和变量

### (一) 中产阶层的分类

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对中产阶层做详细区分是很有必要的。而当对中产阶层分类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如何分层，包括分层的原则和具体标准是什么。从客观角度来看，宗教、财富、资产及劳动力，技术性知识是具有功能性意义的分层原则 (Davis and Moore, 1945)。但是如何看待它们在中产阶层这一群体上的体现呢？中产阶层具备其他阶层不具备的资产或是技术知识，还是他们掌握着任何一种资源的中等规模存量？这些问题从技术层面是可以回答的。此外，从主观角度而言，共同意识或者共同文化，对用来界定中产阶层也是可供选择的标准。但是根据主流的划分方法，职业被作为中产阶层的区分标准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而且中产阶层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有着新的内涵的阶层正在于他们的职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米尔斯, 1987)。职业适合用来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分类，也能够对中产阶层的类型进行区分。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类型化区分就是基于职业的差异，而职业也适合对中国的中产阶层进行细分 (李春玲, 2003)。而考虑到中产阶层在中国独特的产生背景和过程，从形成机制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内源中产阶层和外生中产阶层 (李路路、李升, 2007)。这两种分类的方式都极具启发性，本研究以李春玲的阶层分类为主要分类框架，见表 1 (李春玲, 2011)。在讨论部分问题时，再加入体制内外的分类视角。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私营企业主视为接近于中产阶层的一个群体，主要用来作为参照群体。新老中产阶层同体制内外中产阶层两个分类框架的交互，其实只会对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做出体制内外的划分。

### (二)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调查”<sup>②</sup>，该调查的第一期于 2013 年完成，调查地点为福建省厦门市。由于本期调查为非入户调查，较难获得针对中产阶层的抽样框，所以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具体作法是参

考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厦门市职业分布状况，再综合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配额抽样设计，最终通过判断抽样和雪球抽样完成样本选取，样本规模共计 600 个。

### (三) 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是针对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包容性的测量。在测量时构建了一个社会包容指数，它包含了 6 个询问项目，而每一个询问项目使用李克特量表区分态度差异并进行相应计分，

表 1 EAMC 阶层分类框架与职业的对应关系

EAMC 阶层分类	中产阶层职业类别
老中产阶层	个体户
新中产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政府官员
边缘中产阶层	普通办事人员、企业业务人员
企业主阶层	私营企业单位负责人

资料来源：李春玲. 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 社会, 2011, 2.

<sup>②</sup> 该调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资本：我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1BSH028）的支持。

最终 6 个询问项目的得分累加即为社会包容指数的得分。得分越高者越倾向于对流动人口采取包容的社会态度，得分越低者越倾向于对流动人口采取不包容的社会态度。这 6 个询问项目分别是：1. 流动人口抢占了我的工作机会；2. 流动人口导致治安状况恶化；3. 流动人口导致城市环境恶化；4. 流动人口最终应该返回其家乡（户籍所在地）；5. 流动人口不应该获得我们这个城市的户口；6. 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不应该获得本地居民所享有的权益，如养老、医疗保障、未成年子女到本地公办学校上学等。态度差异分为：很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很同意，它们的计分方式分别为：2 分、1 分、0 分、-1 分、-2 分。

### 三、分析结果

#### （一）嵌入社会结构、阶层认同与社会包容

表 2 中计算得到的社会包容指数的平均分为 2.4 分，显示整个调查样本的社会包容性处在稍高的水平，但这只是中产阶级整体的态度，在其内部不同群体间，社会包容性存在着差异，并且该差异受到嵌入社会结构和阶层认同的影响。所谓嵌入社会结构，是指从中产阶级产生的背景、来源和机制考虑，该群体在中国的出现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关注的嵌入社会结构体现在政治经济层面，具体体现为中产阶级嵌入的不同政治身份和经济部门。表 3 是分中产阶级类别、单位所有制性质、政治身份的社会包容指数的平均分。只从单位所有制性质单向嵌入来看，处于非国有部门各类中产阶级要比处于国有部门的社会包容性高。在非国有部门当中，从企业主阶层、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到老中产阶级的社会包容性逐渐降低，而在国有部门中，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包容性要高于边缘中产阶级。再加入政治身份构成双重嵌入，其中身处国有部门且为中共党员的中产阶级的嵌入程度最高，对这部分群体而言，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包容性依然高于边缘中产阶级。企业主阶层和老中产阶级都处于非国有部门，但是政治身份差异的影响在社会包容性方面有不同体现，身为中共党员的企业主阶层要比非中共党员的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包容性低，但身为中共党员的老中产阶级要比非中共党员的老中产阶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高。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情况稍微复杂，他们同企业主阶层、老中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阶层，

表 2 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

连续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类别变量	比例 (%)
年龄	20	78	37.4	9.70	性别(男性)	50.3
受教育年限	9	19	16.0	1.82	婚姻状况(已婚)	80.5
社会包容指数 <sup>1</sup>	-12	12	2.4	4.24	老中产阶级	3.5
老中产阶级	-7	6	1.9	3.46	新中产阶级	65.2
新中产阶级	-12	12	2.6	4.29	边缘中产阶级	28.0
边缘中产阶级	-10	12	1.7	4.12	企业主阶层	3.3
企业主阶层	-2	12	4.8	4.09	政治身份(党员)	52.2
					所有制性质(国有部门)	56.0
					中产阶级认同(是)	29.8

注：统计的是全样本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后续统计不同类别中产阶级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

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包容性：以厦门市的中产阶级为例

用米尔斯的话来说，他们“要利用他人的财产为他人工作”(米尔斯,1987),他们更依赖于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是这种依赖的影响在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间是不同的。既是中共党员又身处国有部门的边缘中产阶级

的社会包容性最低，而且是否身处国有部门的影响要比是否身为中共党员的影响更大。而对新中产阶级而言，既非中共党员又不处在国有部门的其社会包容性最高。

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其社会包容性有何影响，这种影响又会受到嵌入社会结构的何种影响？为了回答该问题，本研究分别计算出分中产阶级类别、阶层认同、政治身份的社会包容指数以及分中产阶级类别、阶层认同、单位所有制性质的社会包容指数的平均得分，具体结果分别见表4、表5。基本上，除了边缘中产阶级之外，其他各类中产阶级中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低。从政治身份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否为中共党员，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中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都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低，但边缘中产阶级中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高。而对企业主阶层来说，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其社会包容性的影响在不同政治身份上有不同的表现。对身为中共党员的企业主阶层来说，认同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更低；而对非中共党员的企业主阶层而言，认同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更高。是否为中共党员对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包容性的影响还是较为明显的，无论其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中共党员都要比非中共党员的社会包容性低。表5中也得到了表4中相同的结果，即除了边缘中产阶级之外，其他各类中产阶级中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要比不认同的社会包容性低。但从是否处于国有部门的角度来看，无论其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处于国有部门的要比非国有部门的社会包容性低。可以认为政治身份、单位所有制性质对中产阶级社会包容性的影响要比阶层认同的影响更明显，并且政治身

表3 分中产阶级类别、单位所有制性质、政治身份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合计	
	国有部门	非国有	国有部门	非国有	国有部门	非国有
企业主阶层	-	2.714	-	5.846	-	4.75
新中产阶级	2.419	1.969	2.359	3.662	2.391	2.877
边缘中产阶级	0.868	2.78	1.267	2	1.012	2.459
老中产阶级	-	5	-	1.389	-	1.905

注：列联表内的数字为平均值，下同。

表4 分中产阶级类别、阶层认同、政治身份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

	中共党员		非中共党员		合计	
	认同	不认同	认同	不认同	认同	不认同
企业主阶层	1.000	4.000	6.200	5.625	4.250	5.083
新中产阶级	1.500	2.674	2.519	2.993	2.391	2.877
边缘中产阶级	2.462	1.571	3.667	0.894	2.955	1.315
老中产阶级	3.000	6.000	0.167	2.000	0.571	2.571

注：列联表内的数字为平均值，下同。

表5 分中产阶级类别、阶层认同、单位所有制性质的社会包容指数得分

	国有部门		非国有部门		合计	
	认同	不认同	认同	不认同	认同	不认同
企业主阶层	-	-	4.25	5.083	4.25	5.083
新中产阶级	1.694	2.744	2.543	2.990	1.942	2.838
边缘中产阶级	2.238	0.597	3.609	2.032	2.955	1.315
老中产阶级	-	-	0.571	2.571	0.572	2.571

份的影响同单位所有制性质的影响较为类似，但是两者的影响在不同类别的中产阶层中有不同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都是基于样本数据的分布差异，而不是经过统计检验的严格推断。

## (二) 中产阶层社会包容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初步分析，本文发现中产阶层的嵌入社会结构和阶层认同对其社会包容性是有影响的，但是确切的影响，特别是在控制干扰变量之后的影响，需要更严格的分析才能清晰体现。为此，本文将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而在模型拟合策略上，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只包含各类中产阶层作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其次添加控制变量，最后再加入政治身份、所有制性质和阶层认同等解释变量，三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见于表 6。模型中的中产阶层分类变量以边缘中产阶层作为参照组，从模型 1 可以看出企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要比边缘中产阶层的高，并且企业主阶层的最高，而老中产阶层统计上不显著。模型 2 加入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及婚姻状况四个控制变量，模型拟合结果显示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包容性依然是最高的，而且统计上达到显著，而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同边缘中产阶层的差异不显著。此外，性别和婚姻状况的影响也不显著。但是年龄对社会包容性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年龄每提高一岁，社会包容指数的得分减少 0.05 分。提高受教育年限则会显著地提高社会包容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经历，可以使社会包容指数的得分增加 0.34 分。

表 6 中产阶层社会包容指数得分的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中产阶层分类 1						
新中产阶层	0.819**	0.389	0.569	0.405	0.532	0.408
企业主阶层	3.006***	0.996	3.263***	0.987	2.710***	1.001
老中产阶层	0.161	0.975	0.474	0.972	-0.206	0.990
年龄			-0.049**	0.022	-0.042*	0.022
性别 (男性=0)			0.205	0.341	0.058	0.346
受教育年限			0.342***	0.104	0.428***	0.107
婚姻状况 (未婚=0)			0.434	0.502	0.336	0.503
政治身份 (非党员=0)					-0.795**	0.358
所有制性质 (非国有=0)					-0.819**	0.371
中产阶层认同 (不认同=0)					-0.112	0.376
常数项	1.744***	0.325	-2.213	1.977	-2.717	1.975
R <sup>2</sup>		0.018	0.057			0.074

注：1. 中产阶层分类变量的参照组为边缘中产阶层。2.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3. 模型样本量为 600。

模型 3 加入了政治身份、所有制性质和阶层认同三个解释变量，在该模型中，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包容性依然是最高的，而且该阶层类别的效果在统计上依然显著。不一样地是，老中产阶层代替边缘中产阶层成为社会包容性最低的中产阶层群体，但是统计上并未达到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而在控制变量上，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效果未有显著变化。在解释变量上，身为党员的中产阶层要比非党员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显著地低，且低出 0.795 分，而身处国有部门的中产阶层要比非国有部门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显著地低，两者相差 0.819 分。嵌入社会结构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而单位所有制性质的影响要比政治身份的影响略大一点<sup>③</sup>。阶层认同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可以认为无论是否认同属于中产阶层，其社会包容指数得分是没有显著差异的。

#### 四、结论和讨论

##### (一) 结论

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总体上较高，但是不同类别间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存在差异，边缘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最低，其次是老中产阶层、新中产阶层，而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最高。相对而言，企业主阶层处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也是参与市场竞争最激烈的群体，所以市场规则的遵从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更开放的社会心态，从而保持较高水平的社会包容性。但同样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老中产阶层，其社会包容性反而较低，这可能同它实际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有关系。当今中国的老中产阶层以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为主，他们所占有的各方面资源不足，甚至是较为匮乏，所以不像企业主阶层那样具备相对丰富的资源来参与市场竞争，他们的社会结构位置更易被其他人，特别是流动人口所替代。所以老中产阶层参与的竞争与其说是市场竞争，不如说是社会结构位置竞争，这也从侧面说明企业主阶层在社会结构位置竞争中更易获胜，所以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包容性较高。

本研究所区分的四类中产阶层，他们同政治、经济体制间的关系复杂，社会结构嵌入的程度不同，基于交互分类的分析发现，对那些身处国有部门且又是中共党员的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来说，前者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包容性要高于后者。而且还发现既是中共党员又身处国有部门的边缘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最低，而既非中共党员又不处在国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的社会包容性最高。如果说体现为嵌入社会经济结构的政治身份、所有制性质是从社会实在的角度形塑中产阶层的话，那么阶层认同则是从社会意识的角度形塑中产阶层，并且这两种形塑方式对社会包容的影响效果可能并不一致。对全样本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阶层认同对社会包容性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新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而言，阶层认同比党员身份更能影响其社会包容性，而是否处于国有部门又比阶层认同更能影响其社会包容性。

##### (二) 讨论

由于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个阶层应当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它应当是开放、包容的，这一点应该在其社会态度上有所体现。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总体上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态度较为包容，但是在将不同类别的中产阶层条分缕析之后，本文发现社会包容相应地也会有不同表现，它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而这也是中产阶层同现存体制的关联之处。从通用的阶层分类标准来看，企业主阶层严格来说已不能算是中产阶层，但是它产生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市场的力量部分地塑造了该阶层，这一点同历史上早期中产阶层的产生有相似之处，所以

<sup>③</sup> 政治身份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94，而所有制性质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96。

市场的力量可能促使市场经济部门的成员保持相对包容的社会心态。老中产阶级也来自于市场经济部门,但是进入该部门的门槛不高,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社会结构位置竞争都是激烈的,所以不包容的心态是处于地位争夺最前线的直接反应。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同政治、经济体制保持不同强度的关联,能够发现联系越紧密,越倾向于不包容的共存现象,但是一旦拥有较高的资本水平则有可能打破这种“规律”。

那么,同核心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越紧密为什么会导导致不包容的社会心态?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有社会归属的需要,这种需要不单单是外在的展示,更是深层自我安全的需要。为了强化自我安全的观念,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认同,而倾向于支配群体的认同就好过倾向于附属群体的认同(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但是当他们认为群体间的界限是僵硬的、不可改变和难以渗透的话,倾向于认同支配群体存在着很大的难度,但是他们可以采取一系列的社会创造策略使其社会认同变得相对更积极,从而也能实现一定水平的自我安全的需要。在这一系列的策略中,选择一个不同的比较群体是其中的一项。他们可以选择其他地位更低的附属群体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低地位群体对其他的低地位群体表现出了比高低位群体更加明显和极端的歧视”(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中国的经验是如何的呢?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社会是分隔的,对城市居民而言,群体的界限是明显的,但又是封闭的,跨越群体的边界是困难的。而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当中,城乡壁垒被不断打破,跨越结构的边界也有了可能,也给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带来了许多选择,但是那个被广泛认同的支配群体是谁呢?在模糊且多变的身份体系中,关于稳定的支配群体的社会印象仍是深刻的,成为执政党成员、进入国有部门是对成为支配群体一员的最基本的认知,这给身处变动社会中的成员的自我安全需要带来了一种满足的可能。

#### [参 考 文 献]

- [1] Kingsley Davis and Wilbert E. Moore.1945. "Some Principles of Stratific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0): 242-249.
- [2] 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M].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3] 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
- [4] 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江苏社会科学,2008(5).
- [5] 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J].社会,2002(2).
- [6]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6).
- [7] 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
- [8] 李路路,王宇.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阶层认知与政治意识[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
- [9]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
- [10] 李若建.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 [11]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12]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 [13]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下转第56页)



(上接第 30 页)

- [14] 约翰·斯梅尔. 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M].陈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16] 王嘉顺.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 2005 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社会,2010(6).
- [17] 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1).
- [18] 严翊君,李小红.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研究及其价值[J].唯实,2011(Z1).
- [19] 李涛,任远.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南方人口,2011(3)
- [20] 朱羽.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J].南方人口,2004(3)
- [21] 陈文哲,朱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动态变化和内部差异--基于福建省 4 城市的调查[J].南方人口,2008(2)

## The Urban Residents' Social Inclusiveness toward Migrants: 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in Xiamen

*WANG Jia-sh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Abstract:** Urban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migrants is an intrinsic indicator of social inclusiven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iddle class's social attitude toward 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inclusiveness based on a survey in 2013. A indicators system of social inclusiveness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clusiveness of the middle class. It is found that middle class are generally with higher social inclusiveness toward the migrants. However different groups of middle class show differences in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migrants. Generally speaking, margin middle class and old middle class show less social inclusiveness while new middle clas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have more inclusive social attitude. The difference of attitudes is shaped by the social context and the embedd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o mak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iddle class.

**Key words:** Middle class, Social inclusiveness, Migrants